

关玉衡

斩日军间谍中村 燃开鲁抗日烽火

□李洪彬

回望百年风云,1931年的中国大地,正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践踏。这一年,“九一八”事变轰然爆发,侵略者以武力撕开东北防线,妄图将整个中国纳入殖民版图。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中华儿女不愿俯首为奴,他们冲破黑暗,挺身而出,用热血与生命吹响了抗击侵略的号角——在广袤的科尔沁草原上,一簇抗日烽火正由一人点燃,继而燎原成势,照亮了开鲁地区的抗日征程。这人,便是处死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爱国将领关玉衡;这烽火,便是高文彬、李海山、刘震玉等义勇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的抗敌屏障,他们的故事,如今已镌刻进开鲁抗日斗争的光辉史册,成为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关玉衡,原名瑞玑,字以行,满族正黄旗人,1898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学生时代的他,便已怀揣炽热的家国情怀:中学期间积极投身东北学生运动,因立场坚定、行动积极被校方开除;此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被选送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郭松龄部任营长,逐步在军旅中崭露头角。1928年,张学良深知其才干,任命他为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副——正是这一职务,让他与日本间谍的阴谋正面相遇,也让他成为了点燃草原抗日烽火的第一人。



关玉衡

被日军炸毁的开鲁县抗日义勇军司令部。



彼时的日本关东军,早已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北。为制定精准的作战计划,他们以“考察”“旅行”为幌子,频繁派遣人员潜入东北腹地刺探情报:1929年,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大佐便曾多次率人开展“参谋旅行”,走遍东北各地绘制地图、记录军情;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为获取“对苏决战及兴安屯垦地区作战资料”,再次派出中村震太郎大尉,让他以“考察农业”为掩护,潜入军事禁区兴安屯垦区。

兴安屯垦区作为边境军事要地,早有“禁止外人进入”的严令。但中村震太郎并未收敛,6月初,他与助手——日本预备役曹长并杉延太郎一道,拉拢一名白俄人和一名蒙古族充当前向导,四人伪装成中国人,从泰来出发,悄然向兴安屯垦区逼近,一场针对中国军事机密的间谍活动就此展开。

6月25日,屯垦军三团三营官兵在驻地附近发现了这四人的可疑行踪:他们虽着中国服饰,却对地形格外关注,言行间处处透着反常。官兵当即警觉,将四人带回团部审查。面对盘问,中村掏出“东京黎明农业协会”的名片,摆出傲慢姿态,要求屯垦军立即放行。然而,官兵在搜查中查获的物证,彻底揭露了他的伪装——其中不仅有中、日、俄文军用地图各一份,洮索铁路线路图、桥梁涵洞断面图及自绘草图若干,还有两册笔记本:一册明确记载着他接受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任务及在东北的活动地域,另一册则详细记录了与满铁、蒙古公署等机构会面人物的会晤情况;此外,三份报告书更是赤裸裸地列出了兴安屯垦军的兵力部署、枪炮种类与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位置,乃至马匹辎重等核心军事情报,连当地人口、物产、矿藏、水源、地质气候等战略资源信息也一并收录。更令人愤慨的是,他们携带的军用地图均“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显然是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准备;而步枪、手枪、望远镜、罗

盘、绘图用具等装备,进一步坐实了其军事间谍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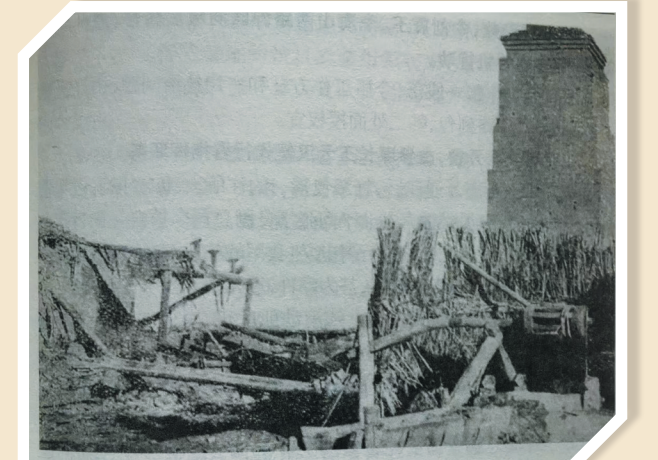
身份暴露后,中村震太郎非但没有认罪,反而态度蛮横、气焰嚣张,竟谎称自己是“陆军大佐”,全然不将中国军人放在眼里。如何处置这伙间谍?关玉衡陷入深思:彼时中国国力孱弱,“弱国无外交”的现实如利刃在喉——若将案件上报,日本方面必定动用外交施压、武力威胁等手段索回人犯,甚至可能倒打一耙,栽赃屯垦军“蓄意挑衅”。为守住国家机密、捍卫民族尊严,关玉衡召集全团干部开会商议,众人一致认为:兴安屯垦区为禁区早已明令公示,中村间谍证据确凿,上报必被日方索回;依据国际惯例,对军事间谍可就地处决。为确保万无一失,关玉衡又对中村进行了第二次审问,可对方依旧蛮横,甚至与官兵发生肢体冲突。忍无可忍之下,关玉衡下令:将中村震太郎一行4人秘密处决,用行动粉碎了日军的情报阴谋。

处决中村后,关玉衡的抗日决心愈发坚定。1932年初,他化名“国尔家”,从北平辗转至上海,加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并担任委员,专门负责辽北抗日义勇军的后续工作;6月,他又改名“郭尔佳”,乔装潜入哲里木盟开鲁县,与同僚宣传专员高文彬携手,先后建立开鲁后援会与辽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任右路军指挥,高文彬任义勇军第五路司令,一支扎根开鲁的抗日武装就此诞生,草原上的抗日烽火,开始以更炽烈的姿态燃烧。

同年8月,开鲁后援会决定发起通辽战役,由关玉衡、高文彬共同指挥。31日凌晨3时30分,总攻号角吹响:高文彬率800余名将士从西门佯攻,诱敌深入;辽北蒙边第一路骑兵司令李海山率部从北门向南突击;第二路司令刘震玉则领兵从东门强攻。义勇军将士们抱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激战至下午3时,营长解国忱带领200余名大刀队员,顶着日军的猛烈炮火搭起人梯,翻墙突入城中。大刀挥舞处,日寇惨叫连连,此役共砍死日军60余人,大刀队员虽伤亡8人,却极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当晚9时,日军调集2000名伪军增援,为避免陷入重围,义勇军果断决定停止攻城、撤回余粮堡。此役,义勇军共毙敌17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首战便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10月4日凌晨4时,李海山、刘震玉率部卷土重来,兵分两路再次攻打通辽。将士们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不仅击毙日军大佐1名、士兵30余名,更于次日凌晨5时成功攻占通辽小街基,用胜利回应了侵略者的反扑。

10月6日,关玉衡紧急筹集5万发子弹,连夜送往李海山、刘震玉部;当晚10时,义勇军发起第三次通辽攻势。此时的日军已加强防备,调集坦克、装甲车扼守城内各主要入口,阻击火力远超此前。义勇军虽只有步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却依旧奋勇进攻,最终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激战至次日凌晨4时,因装备差距过大,为保存有生力量,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



日本关东军飞机炸毁的开鲁县民房。

事实上,在第一次攻打通辽后,关玉衡便已开始谋划更大规模的抗敌行动——他在余粮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辽源(今郑家屯)。10月26日,辽源守城伪军田涛、于海川派特使面见关玉衡与高文彬,明确表示“愿做内应,为义勇军引导巷口”,这一消息让将士们士气大振。10月27日凌晨2时,总攻准时发起:高文彬率部从西南攻入城内,直抵柴市,却被日军的铁丝网工事与密集火力阻挡;李海山率部沿铁路从城南向城内推进;刘震玉领兵从城西进攻;白梦梅则率直属独立支队突袭火车站,烧毁日军一座库房;城内伪军也如约举兵策应。一时间,日军阵脚大乱,纷纷向城外溃退。下午1时许,日伪军1500余人赶来增援,从南北两面用炮火轰击义勇军阵地;随后,20余架日军飞机也飞抵战场,对义勇军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将士们伤亡惨重。血战至下午4时,日军已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将义勇军全歼。为避免更大损失,关玉衡当机立断,下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至康平县——当地群众得知义勇军到来,纷纷夹道欢迎,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这支抗日队伍的支持。此役,义勇军共毙敌340余名,虽未攻克辽源,却再次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三打通辽、激战辽源的壮举,震惊了敌伪阵营,更鼓舞了吉热辽边的人民群众。北平后援会特意送来4万元慰问费,为部队制作冬装,并任命关玉衡为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左、右路军总指挥。1933年1月,关玉衡指挥2000余名义勇军,趁夜幕包围巴拉沈营子日军营地,随后发起突袭——将士们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与高昂的斗志,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日军70余人,缴获大卡车1辆、枪支60余支,用胜利开启了新一年的抗敌征程。

时光荏苒,当年的烽火早已散尽,但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身影、在饥寒交迫中坚守的信念,永远不会被遗忘。关玉衡、高文彬、李海山、刘震玉……这些抗日爱国将士,用鲜血染红了中华大地,用生命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他们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缩影;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守护国家的和平与尊严而不懈奋斗。

解码 1912-1918 的通辽速度

□张成

从清末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麾下荒原牧场,到建制完整的通辽县,这片土地只用了短短6年。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巴林爱新觉罗的放牧声,为通辽的崛起拉开了序幕——在此之前,“通辽”这个名字尚未载入史册,这里还只是卓里克图亲王牧场中一个名为巴林他拉(又称白音太来)的小小村落。

荒滩起步:规划先行的建镇序章

1912年5月,巴林爱新觉罗正式放牧。与以往蒙旗放牧的随意性不同,此次放牧秉持“规划先行”的原则,为这片土地的有序发展奠定了根基。1913年,通辽镇基规划完成,随即启动掣签招领,商户与住户接踵而至,荒原上初现烟火气。

1914年,通辽镇正式建立,划归奉天省洮昌道辽源县(今吉林省双辽市)管辖。谁也未料到,这个新生的镇子会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仅仅4年后,更跻身“东蒙都市”之列,成为塞外草原上的一颗新星。

荒务缘起:一场偿还京债的土地变革

通辽的崛起,始于一场特殊的“土地交易”。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科左中旗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为偿还京债,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呈请开放自家牧场。经赵尔巽请示大总统袁世凯批准,这一请求终获同意,一片沉睡的荒原由此迎来命运转折。

这片待放的荒地,东起巴林他拉,西至爱新庙(今科尔沁区育新镇幸福村),南抵小细河(今洪河),北达西辽河南岸,东西长约50里,南北宽约30里,总面积达6.7万多顷。因取东西两端地名,“巴林爱新荒”这一历史名词应运而生。

按照当时规定,漠南蒙古放牧土地的收入需“一半归国家”。为此,东三省总督专门设立巴林爱新荒务局,统筹放牧事务。首任局长(初称“总办”)由正任呼伦贝尔兵备道黄任福担任,虽为临时机构,却直属于奉天省,足见对这片土地的重视。

六年蝶变:从镇到县的“通辽加速度”

通辽的发展速度,究竟有多惊人?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清晰的轨迹。

1915年5月3日,距通辽建镇仅一年,尝到发展甜头的卓里克图亲王便致函巴林爱新荒务局,恳请在通辽镇西60里处添设新镇基,形成“犄角之势”。荒务局随后向奉天省巡按使呈文,文中转述卓亲王咨文,字里行间满是对通辽发展的惊叹:“本亲王开放巴林爱新牧场,前由贵局长会同蒙员择于巴林他拉地方设立镇基一处名曰通辽镇,详报筑放在案,一时购者踊跃争先,甫及年余,而建筑已鳞次栉比,俨成市镇,商贾行旅莫不称便。”

同年年初,奉天巡按使张元奇已敏锐察觉到通辽的潜力,向民国政府呈报《设置通辽县立案书》,直言:“至辽源县通辽镇地方面积甚广,户口日繁,该处距县穹远,亟须增设县佐,籍资治理。”

内务部随即向大总统袁世凯呈立案报告,进一步强调通辽的战略价值:“惟查辽源县通辽镇地方介在蒙荒,商民萃集,距县治二百四十里之遥,实为边地要隘。该省请添置县佐一缺,洵为裨益边治起见,拟请准予立案,作为五年度设置之缺。”此次立案将通辽设县期限初步定为1915年至1919年,而通辽的发展,再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1915年7月22日,袁世凯发布批令:“如呈照准,即由该部转行遵照。表存。此批。”批文上加盖大总统印,并有“国务卿徐世昌”的签署,为通辽的升级之路按下“加速键”。

时间来到1918年初,奉天省长张作霖向民国政府呈递《通辽镇改设通辽县报告书》,用详实的数据展现了通辽的爆发式增长:“通辽镇地方原系开放巴林爱新荒段,在辽源县西二百四十里,向属该县管辖。民国四年曾经呈请设立县佐一缺,迄未实行。迨来,该镇发达迥出洮属各县之上。去岁新放达旗河南河北荒,与该镇毗连,合计面积六千五百里方,男女丁六万余口,已垦熟地二千二百余方。举凡行政、司法诸大端,均非县佐职权所能及。加以四郊路成,形势又为之一变,外人之赴内外蒙暨热河贸易游历者,络绎不绝,该镇尤为出入孔道。内政外交,日益繁重,势非改设县治,不足以资驭而重边防……”

彼时,洮昌道管辖洮南县、昌图县、辽源县等10余个县,而设镇仅5年的通辽,其发达程度已远超这些县的城关镇。这份报告书经内务部、财政部、司法部等部门调查核实后,呈报给民国大总统冯国璋。1918年6月26日,大总统正式批准通辽设县——

从一片荒原牧场到建制县,通辽仅用了6年!这,便是载入史册的“通辽速度”。

东蒙都市:历史文献中的通辽荣光

《奉天通志》(第66卷)对通辽的记载,尽显其“东蒙都市”的地位:“本县地势据西辽河北岸平原沃野,铁路中贯,东接四洮,南连打通,西越蒙旗,为往来热河、开鲁要道,俨然东蒙都市。”在《奉天通志》对所属各县的记载中,唯有通辽获此赞誉,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速度密码:通辽崛起的三大基石

通辽为何能在短短数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历史给出了清晰答案。

枢纽区位:铁路动脉贯通南北。通辽地处蒙边,交通区位得天独厚。1921年11月1日,四洮铁路郑通支线正式开通;1927年,京奉铁路打(打虎山)通支建成,两条铁路随后并轨——这一变化,让通辽一跃成为连接东北与华北、辐射全国的交通枢纽,成为内外蒙与热河地区商贾往来的“咽喉要道”。

商贸繁荣:蒙东商埠集聚八方。依托交通优势,通辽迅速成为蒙东和东北西部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1926年,通辽商业迎来鼎盛期,商铺数量达1500余家,富商巨贾云集;1935年,县城内资金超千元(现大洋)的商户有70余家,东泰隆、隆兴玉、天庆东、同乡居、庆裕元、元记号、汇昌信、隆兴当等“八大商号”声名远播,撑起了通辽的商业版图。

产业兴旺:农牧并举奠定根基。农业方面,民国时期通辽耕地已达135万亩,高粱、谷子、玉米、大豆等作物广泛种植;1943年,蓖麻种植面积达15万亩,蓖麻子出售量623.4万公斤,线麻出售量68万公斤,两项指标均居东北首位。畜牧业更是通辽的“王牌”,这里是东北肉牛供应第一大市场,在蒙东与东北地区首屈一指。

此外,高官与富商的人局,也为通辽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巴林爱新荒开放后,张作霖、吴俊升、冯麟阁、马龙潭等军政要员纷纷来此置地经商。通过第一个大型工业项目——通辽电灯厂(发电厂),便是由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投资兴建,开启了通辽工业化的序幕。